

●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双效”统一

《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

● 加速集团化进程,完成股改上市

《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在转企改制的基礎上,鼓励支持业务相近、资源相通的新闻出版单位,按照优势互补、自愿结合的原则,跨地区跨部门组建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支持条件成熟的出版传媒企业,特别是跨地区的出版传媒企业上市融资。

● 加快推进文化立法,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

强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鼓励社会力量捐助和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渠道变革日新,线上线下共同发展

《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建立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相配套、乡镇网点为延伸、贯通城乡的实体书店建设体系,形成大型书城、连锁书店、中小特色书店及社区便民书店、农村书店、校园书店等合理布局、协调发展的良性格局。

8 维度

勾勒中国书业

10 年新变革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田红媛

40年弹指一挥,文化体制深化改革迎巨变;新10年新变革,中国书业砥砺前行谱新篇!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40年,也是中国出版发行业不断壮大的40年。从1978年的105家出版社、年出版图书约1.5万种,发展到2017年580余家出版社、出版图书近50万种、总印数92.4亿册、出版物销售总额3704亿元,中国书业40年来经历了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落后到领先的艰辛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40年来,我国出版发行业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了科学有效的宏观管理体制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出版市场体系,出版企事业单位的活力和积极性得到充分释放;一批典型的文化企业得以迅速成长,注重提质增效,在中央政策的指引下,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打造了一大批优秀主题图书和大众、学术出版物。

40年来,出版发行集团基本完成转企改制,并借助政策和资本的东风,上市融资,进行收购、并购,在资本市场一展身手;大型出版发行集团打破条块分割,进行跨地域重组、跨区域合作,调整产品结构,优势互补形成合力。

40年来,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党中央从顶层设计上指引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着力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服务体系,加大对出版基础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力度,《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施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出台指日可待,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40年来,国有新华书店持续发挥主阵地作用,民营书业合法地位得到“盖章认可”,图书电商形成“三足鼎立”局势,自媒体、社群营销拉动图书销售;以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北京图书订货会、全国书博会、上海书展、南国书香节为代表的全国性、地方性展会实力倍增,在国内乃至国际产生重要影响,业内、业外会展经济效应凸显。

40年来,伴随着互联网的渗入,云技术、大数据、AI、VR、AR、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层出不穷,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

40年来,中央在税收、金融等政策方面对文化“走出去”给予支持,中国出版从作品“走出去”,逐步到品牌“走出去”、资本“走出去”、作家“走出去”,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在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在中国书业迈入新时代之际,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从宏观视角出发,以顶层设计为主、产业经营为辅,概述前30年变迁历程,细数近10年行业大事,一展中国书业改革发展成就,为新时代的新发展提供参鉴。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双效”统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40年来,我国文化企业迅速成长,文化精品不断涌现,文化市场更加繁荣。与此同时,如何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也成了业内始终关心的一大问题。近10年来,中央多次出台方案、意见,强调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重要性,为我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发展指明方向。

2014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突出方向引领,明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同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

上受到欢迎。”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并被列入当年中央深改组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对促进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意见》指出,“文化企业提供精神产品,传播思想信息,担负文化传承使命,必须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建立健全确保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文化企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

加速集团化进程,完成股改上市

在2003年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大多数出版集团完成企业改造,建成法人治理结构。近10年来,个别综合实力雄厚的单体出版社、部委社加速集团化进程,教育社、少儿社等出现子集团裂变效应,大型出版发行集团进行跨地域重组、跨区域合作。多数出版集团借助政策和资本的东风,进一步完成股份制改造、上市融资。

继中国出版集团、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之后,2013年部委社合并成立专业化集团出现典型案例,以人民邮电出版社和电子工业出版社为基础的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成为第5家“国字头”出版传媒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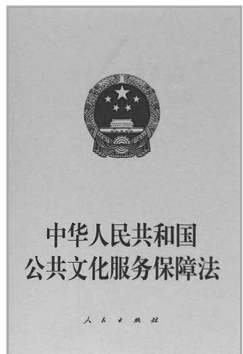
200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完成改制,组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2014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成为国内首家内生裂变而成的少儿出版集团,在图书出版、数字转型、版权输出等方面产生示范效应。

加快推进文化立法,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与日俱增,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有待充实,体系建设刻不容缓。经过10年蜕变,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框架已经搭建,初步实现了从传统文化事业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转变,公共文化服务配置向基层倾斜、优质产品供给日益丰富、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显著提高,充分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顶层设计上指引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将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明确提出到2020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步入发展快车道。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鼓励社会力量捐助和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在地方立法上,广东省2011年制定了《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条例》,这是全国第一部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综合性地方法规,提供了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立法的一种整体



思路。江苏省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条例》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管理办法》,上海市制定《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规定》,探索公共文化服务立法。

2014年3月,由文化部牵头,26个部委组成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协调组成立,承担起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统筹协调职责,推动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初步形成了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框架。

2015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对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作了全面部署,为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

2016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并于2017年3月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文化领域的第一部基本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在2018年1月正式施行,成为党的十九大后的首

渠道变革日新,线上线下共同发展

40年书业变革中,新华书店作为国字号发行渠道,始终发挥着主阵地的作用。“二渠道”民营书业凭借灵活的机制、敏锐的市场反应能力、逐渐形成的品牌优势以及可圈可点的复合经营表现,在书业市场中站稳脚跟。三大图书电商迅速崛起,线上成为发行渠道的半壁江山。

面对实体书店在2011年前后经历的“倒闭潮”,2013年12月,财政部发布《关于延续宣传文化增值税和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免征图书批发、零售环节增值税。2016年6月,中宣部等11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将实体书店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考核



评价体系,纳入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校园考核评价体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推动实体书店在城市文化功能建设中发挥重

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

2017年,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表示,将推动已制定“双效统一”考核办法逐步落地实施,在上市国有出版传媒企业开展股权激励试点,推进职业经理人试点相关工作,推进制作与出版分开改革试点稳步扩展,适时扩大对外专项出版权试点。

为减少职能交叉,适应新形势,提高管理效率和文化传播力,2013年、2018年中央分别进行了两次机构改革。2013年,国务院将新闻出版总署与广电总局职责整合,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加挂国家版权局牌,主要负责监督管理新闻业、出版业、广播电台、电视媒体和电影业。2018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基础上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新闻出版工作。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新闻出版管理职责划入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对外加挂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牌子。



中南传媒、天舟文化分别在2010年,凤凰传媒、皖新传媒分别在2011年,读者传媒、中文在线分别在2015年,南方传媒、新华文轩分别在2016年陆续完成上市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新股审核进度逐步提速后,中国出版、中国科传、新经典、掌阅科技、山东出版、世纪天鸿6家出版企业上市,创历年最多。中国出版、中国科传两支出版“国家队”成功上市,成为2017年度出版业备受关注的资本事件。

部文化立法,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公共图书馆法律界定和一系列制度规范,对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健全文化法律体系,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从2007年农家书屋建设启动到2008年全面铺开,截至2017年10月末,全国有农家书屋58.7万家。10年来向广大农村配送图书突破11亿册。农民人均图书拥有量从工程实施前的0.13册增长到现在的1.63册,增长了10余倍。10年来,在增强农民文化自信、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10多年来,我国全民阅读立法迈出实质性步伐,全民阅读活动有序开展,全民阅读氛围日益增强。2006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原新闻出版总署等11个部门联合发起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从2012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联名13位政协委员,提出了《关于将城市阅读指数纳入文明城市指标体系的建议》,到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历史性地写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标志着全民阅读已经成为党中央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再到2014年全民阅读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战略,至此连续5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3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向社会公布《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我国全民阅读立法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要作用。

发行集团将大书城的重装改造、实体门店的转型升级作为一项长远规划。2015年1月,以广州购书中心重装开业为标志,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多数大书城陆续完成或初步完成了转型升级改造,注重舒适的店面环境,扩展经营业态类型,把关图书品种选择,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整合线上线下渠道,适应读者多元需求的发展大势。另一方面,发行集团还加大了电商平台的开发力度,新华文轩、博库网、北京发行集团北新云网、重庆新华阅淘网、河南新华云书网、广东新华悦读网等“新华系”电商,进行营销组织创新与供应链体系优化、实施项目合作制和供应链体系、建社群打造互动平台等方式,迎来变革新机遇。“24小时无人智慧书店”“智慧书城”“共享书店”从新概念发展为新业态。(下转第7版)